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丛书

闵维方 丁小浩 主编



Educ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教育与代际流动

郭丛斌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丛书

闵维方 丁小浩 主编

教育与代际流动

郭丛斌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与代际流动/郭丛斌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丛书)

ISBN 978-7-301-15736-7

I. 教… II. 郭… III. 教育—关系—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国
IV. G52 F24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7087 号

书 名: 教育与代际流动

著作责任者: 郭丛斌 著

丛 书 主 持: 李淑方

责 任 编 辑: 李淑方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5736-7/G · 2664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站: <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 子 信 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180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丛书序言

本套丛书的作者由近年来我们指导的几位博士研究生组成。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和管理专业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广泛阅读了国际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大量文献,掌握了教育经济和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在参与相关的研究课题中对中国教育和社会变革的情况加深了理解,锻炼了问题意识,并受到了研究过程和方法的较为系统的训练。本套丛书是他们在各自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充实、改进,使之更上一层楼的成果。这次与读者见面的是丛书的第一辑,共有6本,今后我们还会不断推出这一系列的新作来。

丛书的各篇著作各有千秋,虽然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我们认为它们至少在以下几点上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及参考意义的:第一,丛书所涉及的论题都是关乎中国社会和教育发展中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而作者们切入的角度又使得这些研究问题具有了深刻的,值得进一步开发的学术价值。第二,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的多数理论是在西方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着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和局限性,要在中国得到合理的应用和解释必须经历本土化的重建。几位年轻的作者,以活跃的学术状态和认真的科学精神,努力尝试创新而非盲从的学术研究,对现有理论的应用进行了跨文化的探索,程度不同地尝试了对相关理论的本土化移植和运用。第三,这些论著大多对相关论题

的研究进展进行了非常系统的文献综述,一方面这可以为读者们了解相关领域里国内外的研究进展提供丰富的素材,而且也为认识作者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将该领域研究所做的推进提供了清晰的线索。第四,作者们积极实践了以注重实证为价值取向的研究。他们没有停留在概念层次里转圈子,而是在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上认真下了一番工夫,他们或者通过新的研究角度对问题运用新的解释逻辑,或者通过认真的研究设计,创造性地架起从概念层次到经验层次研究的桥梁。

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是一个接受学术训练和积累学术思想的过程。本套丛书的作者对中国教育经济和管理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兴趣盎然,他们力图对涉及教育领域的重要的经济和管理难题做出有独到见解的实证研究和解释。作为导师,从论文的选题,到分析的视角,从研究设计到结果含义的凝练,在这既令人兴奋也时常是充满了磨难的求索过程中,我们与年轻的作者们共同体验了治学的艰苦,也一起分享了成长的喜悦。看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们在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笃实的治学风格、忘我的治学精神和睿智的治学方法等方面所取得的长足的进步,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同时也借此机会,祝愿他们再接再厉,励精图治,不断进步。

我们谨以这套丛书奉献给正在教育经济和管理领域中探索着的人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此套丛书能够激发更多人的思考和兴趣,引发更多人的参与和探讨,这对繁荣教育经济和管理学界的学术氛围将是有所裨益的。

我们深知这套丛书对中国复杂的教育和社会变革的分析和解释可能仍有不少隔靴搔痒甚至是幼稚和错误之处,我们将以真诚和愉快的心情,听取来自广大读者的批评意见。

最后,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此套丛书顺利出版所提供的支持。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丛书主编

闵维方 丁小浩

2007年10月

目 录

- 绪论 (1)
- 第一章 教育与代际流动研究的逻辑起点 (15)
 - 第一节 教育：代际传承的复制机抑或代际流动的
助推器 (15)
 - 第二节 教育与代际流动研究的数据基础 (21)
- 第二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状 (26)
 - 第一节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27)
 - 第二节 划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标准 (38)
 - 第三节 中国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划分 (41)
 - 第四节 中国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的
划分 (47)
 - 第五节 中国存在职业和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的
原因 (54)

第三章 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代际流动的特征	(58)
第一节 代际流动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59)
第二节 衡量代际流动的指标	(72)
第三节 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 流动	(78)
第四节 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之间的 代际流动	(93)
第五节 收入代际流动	(103)
第四章 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	(114)
第一节 教育与代际流动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116)
第二节 衡量教育促进代际流动功能的方法	(120)
第三节 教育与主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 流动	(126)
第四节 教育与高、中、低收益行业之间的 代际流动	(146)
第五节 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	(153)
第六节 教育与代际流动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163)
第五章 影响教育促进代际流动功能的因素：	
一个多水平模型的分析	(170)
第一节 多水平模型	(171)
第二节 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规模及机会分布对教育 功能的影响	(178)
第六章 教育与代际流动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191)
参考文献	(200)
后记	(210)

绪 论

公平和正义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尺度,是千百年来人类追求的美好理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思想,表现出追求一个公平和均等社会的强烈愿望。宋代王安石推行改革变法,主张抑制豪强,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近代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无独有偶,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的柏拉图,近代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也曾对西方社会的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进行过多方面的深刻探讨(刘相,陈家付和臧传琴,2005)。古今中外的这些学者和政治家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期待和设计,始终贯穿着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向往。代际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追求代际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合理的代际流动有助于促进代际公平

代际公平是指不同家庭出身的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子代社会成员在各类资源的获取和社会地位的实现过程当中,受父代社会成员的影响较少;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流向强势社会阶层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而强势社会阶层子女继续滞留在强势社会阶层的可能性则相对较小。社会公平包括横向公平、纵向公平和代际公平[萨卡罗普洛斯(Psacharopoulos)和伍德豪尔(Woodhall),1985],追求代际公平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代际流动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式与暴力式两种类型。和平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中国古代和平式代际流动的机制包括参加科举考试、行医和当兵等。暴力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推翻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优势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中国历朝历代中胜利的农民起义即是暴力式代际流动的典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由社会底层的农民跃升成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和平式与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相对较强,政府通过社会阶层体系这一社会激励机制,在承认合理的社会差别的基础上,激发社会活力,把社会资源和机会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

力,从父辈较低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从而使得社会关系得以协调处理,代际公平得以保证。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成员在社会地位实现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马太效应,即社会地位较高阶层劳动者的子女拥有比其父母更高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低于其父母的社会地位,最终使强者子女更强,而弱者子女更弱。这种马太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破社会成员所能容忍的程度,就容易引发暴力式的代际流动。因此,缺乏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将会削弱整个社会的代际流动程度,损害代际公平,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

代际流动的一般规则有两个基本类型:先赋性规则和后致性规则。按照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先赋性规则往往以传统的农业主导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构造为基础,在这种规则下,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其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即家庭背景。相形之下,后致性规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构造为基础,在这种规则下,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更多地取决于其后天的能力和努力,如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等(陆学艺,2004)。当然,这两种原则在一个社会中并非在唱独角戏。在传统社会中,先赋性规则是其主要社会流动规则,但后致性规则也会对代际流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样,在现代社会中,后致性规则是主要的代际流动规则,但先赋性规则仍然会对代际流动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有时这种阻碍作用甚至比后致性规则的促进作用还要强,一旦这种现象持续时间过长,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就会被破坏,社会矛盾容易被激化,整个社会将难以和谐。

二、中国代际流动状况的历史回顾

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现正逐步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国代际流动状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呈现不同的特点。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俗语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代际流动状况的生动写照。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自给自足是社会的基本特征,农民占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在这一相对落后的社会形态中,社会成员的资源获取能力和社会地位主要通过世袭获得,而参加科举考试,以期金榜题名是许多社会弱势阶层劳动者子女获得较强资源获取能力和较高社会地位的最有效途径。他们通过接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从而摆脱其祖祖辈辈世代的宿命轮回。但纵观整个传统社会,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社会地位跃升的社会成员毕竟属于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弱势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在社会地位的金字塔中,只能占据与其父母大致相同的位置;而绝大多数优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在其父母的庇佑下,亦能世代享受荣华富贵,身居社会地位金字塔的顶层。在此种社会结构下,代际传递是其最基本特征,先赋性规则是社会流动的基本法则,整个社会较为封闭。

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间段当中,中国实行的是单一所有制结构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此种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对资源配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均掌握在政府手上,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弱,尤其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各种分割,比如城乡分割、所有制类型分割和职业分割等,使得不同类型劳动者之间的流动更为困难。与城市劳动者相比,农村劳动者是弱势

群体,他们不能享受城市人所拥有的子女教育、健康医疗、住房和食物补贴等方面的福利;与全民所有制和部分集体所有制劳动者相比,其他所有制劳动者也属于弱势群体,他们不能享受终身制、养老和子女入托等福利;与干部相比,工人亦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不能从事管理工作,接受培训和提升到党政部门领导的机会也比较少。这种制度划分人为地为不同类型的人员流动设置了障碍,这些障碍使得不同类型人员之间的流动较为困难,这种人员的流动困难使得代际的流动较少,整个社会较为封闭。

当然,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一定的代际流动机制,例如农村劳动者的子女可以通过上中专、上大学,或参军实现其户籍的转变,从而实现其社会地位的跃升。此外,这一时段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特别注重吸纳来自较低社会位置群体的成员,从而导致了一个相对平等化的社会结构,有利于出身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向上流动(李春玲,1997)。换言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先赋性规则和后致性规则在促进代际流动的作用方面,更多地受到国家政策制度安排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逐步实现从单一所有制结构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迅速提高,个人自主择业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整个社会的开放性也愈来愈强,这些都为代际流动提供了必要条件。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的职位也迅速增加。1978—2001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6%,而职业岗位点增长率为3.41%,职业规模从4亿个增加为2001年的7.3亿个。职业总量的绝对增长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为职业间的流动拓展了空间(陆学艺,2004)。职业数量的增长加速了整个社会的代际流动。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存在许多有利于代际流动的因素,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存在一些有碍于代际流动的因素,如:计划经济时代的“顶替”和“接班”等子承父业的现象在改革开放后的潜在影响;两千年传统文化下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的影响;父亲对子女才能的代际传递和家庭对子女潜移默化的社会化影响等。这些因素将会强化社会成员资源获取能力和社会地位的代际效应,使强势群体子女仍然强势,而弱势群体子女依然弱势。那么在这两股正反力量的作用下,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将会呈现一个怎样的特点呢?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劳动力市场内部的差异日益明显,社会分层日趋显著。不同职业和行业的收入和福利差距日趋扩大,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日益凸现。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将使中国代际流动的范围也可能会呈现一定的分割。换言之,整个社会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表面上虽然呈现一定的向上流动性,但其向上所流向的职业依然囿于弱势社会阶层,仍然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虽然向下流动,但其流动范围仍然限于在强势社会阶层的职业之中,仍然属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在此情况下,虽然社会的代际流动性较强,但这种流动范围的分割性将会严重抹杀代际流动所带来的开放性,这将不利于社会公平,有碍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鉴于此,探讨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中国代际流动的特点将会是本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

三、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

如前所述,后致性规则主要是指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其后天的努力和能力。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作为

衡量其个人能力的一个有效信号,对其社会地位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古代中国,接受教育、参加科举成为众多社会底层劳动者子女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捷径之一。对于统治者而言,通过教育这种相对公正的筛选工具选拔人才,以保证社会正常有序的流动则是他们维系社会稳定的一种利器。唐太宗李世民目睹众多举子在规规矩矩列队进入科举考场时所发出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之感慨,充分体现了教育在统治者选拔人才,维系统治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鉴于教育在吸纳人才,维护统治方面的功能,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教育都比较重视,这使得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得以较大程度的发挥。

时至工业社会,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趋势日益明显,各类工作的专业化程度也日益提高。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要求有大量接受过足够教育的劳动者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此情况下,接受足够的教育成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获得较好工作的基本条件之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者就有更多的机会实现代际流动,以流向比其父母更高层次的职位。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日益提高,一些新兴的职业和行业不断涌现,这些新兴的职业和行业对从业人员的教育程度一般具有较高的要求。那么在此情况下,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作用如何,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这种作用的方向和强度将会呈现一个怎样的变化趋势?这将是本书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四、影响教育促进代际流动功能的因素

先赋性规则和后致性规则是代际流动的两大规则。这两

大规则的作用模式还会受宏观制度政策环境的影响。在不同社会制度环境、不同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教育规模和教育机会分布的条件下,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促进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程度可能不尽相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GDP 总量的增长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近几十年来,教育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从 1982 年的 22.8% 下降到 1990 年的 15.9%,又下降到 2000 年的 6.7%,年均下降 6.58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按每年 3.66% 的平均速度递增。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从 1982 年的 5.33 年提高到 2000 年的 7.85 年,增加了 2.52 年,提高幅度达到 47.28%,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幅高出 3.6 个百分点,接近世界平均增幅的 4 倍(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2003)。

在基础教育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也开始逐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到 1999 年则开始进行大规模扩招,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从 1998 年的 108 万人,扩大至 1999 年的 160 万人,2001 年的 268 万人和 2005 年的 475 万人。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高等教育机会总量也迅速增加。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的推行,高等院校的学费日趋见涨,一些弱势阶层子女因无足够经济支付能力而无法接受高等教育,这使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布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有鉴于此,笔者将探讨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机会总量和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状况与教育促进代际流动功能的关系作为本书研究的第三个问题。

五、选题的意义

探讨教育的功能是教育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内容。教育经济学的三大基本理论中,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者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功能。筛选理论认为教育并不能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但它具有传递劳动者能力高低信号的功能,是一种帮助雇主筛选求职者的手段或装置。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当中,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的功能并不在于通过提高个人生产率来提高个人收入,而在于决定一个劳动者在主要还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认为教育的功能只不过是在再生产原有的生产关系,它对弱势社会阶层劳动者子女社会地位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没有作用。上世纪 80 年代,卡诺依(Carnoy)和列文(Levin)在教育经济学三大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对抗论”,他们认为民主国家的教育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在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为社会弱势群体向上流动提供可能性机会。

纵观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教育经济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其发展动向正逐步由传统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转向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相互渗透和交叉发展(曲恒昌和曾晓东,2000)。本书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引入社会学的代际流动问题分析教育的功能,有利于促进教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符合教育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强调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收入决定机制不尽相同,两级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较大的流动障碍。代际流动研究则主要关心两代人之间社会地位和工作特征的

流动,主要强调的是两代人之间的变化。事实上,代际流动可能也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特点,如主要劳动力市场社会成员的子女可能流向依然是主要劳动市场的职位,而次要劳动力市场社会成员的子女可能只能流向次要劳动市场的职位,其流向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较小。在此情况下,整个社会虽然也存在一定的代际流动,但这种代际流动范围的分割性实际上已掩盖了代际不公平的事实。因此,将教育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抗论和社会学的代际流动相结合,探讨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将更有助于人们理解代际流动特点,有益于丰富社会公平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and 对抗论,以及社会学的代际流动研究,有利于促进教育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融合,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本书改变传统代际流动研究中只考虑职业或只考虑收入代际流动的研究模式,将职业、行业和收入这三个维度综合考虑以分析中国的代际流动特点,有助于丰富代际流动研究;用教育经济学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and 对抗论分析代际流动问题,有利于增加社会流动研究问题的理论色彩。另外,对于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and 对抗论,许多理论批评家所指出这两种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其定量实证研究和计量分析的色彩较弱。本研究将试图通过定量实证分析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教育的社会功能,从而探讨赋予这两个理论更多的计量和定量实证色彩。

根据代际流动的通畅程度,人类社会可以分为封闭性社会和开放性社会。在封闭性社会里,代际流动闭塞受阻,一个人自出生之日起就注定要在其父辈所属的阶级和阶层里终了一生,代际流动的机会非常少,要想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许欣欣,2000)。这将使得“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成为社会的普遍现